

乐大典》中辑出古代著作五百余种，其中较著名的有《续资治通鉴长编》《旧五代史》等。辑佚和校勘并不是编纂类书时的原有目的和功用，但由于类书以辑存资料为主这一重要特点，它流传至今，客观上起了这样的作用。

综上所述，类书萌芽于两汉，产生于六朝，繁荣于唐宋，大备于明清。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大致的脉络。到了清代乾嘉以后，创编的类书极少，而以翻印旧有类书为多。盖清代后期，由于帝国主义的人侵，中国社会性质起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封建统治者利用编纂类书宣扬封建教化进行思想统治的老办法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同时随着封建文化的没落和近代科学的发展，类书这一陈旧的体制也已经远远跟不上新兴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代之而起的是百科词典，专科词典、手册、年鉴和百科全书等新型的工具书。不过，对于千百年来留下的类书这一宗文化遗产，今天我们还应本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指导思想，研究鉴别，批判利用，从“类书”这一丰富的矿藏中，发掘资料，推陈出新，使之“为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而努力”这一宏伟目标，发挥应有的作用。

重视地方文献的史料价值

范希宏

对于号称文物之邦的江西，多注意收集、保存历代地方文献资料，从而使我省在图书收藏上具有地域特色，值得重视。

最近在古籍普查中，吉安市图书馆发现了一本《瞻岩尺牍》（〔清〕刘绎撰）。乍看这只是一部平常的古籍图书，作为地方文献资料，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具有十分有用的价值。到目前为止，全区仅仅发现了这么一部（残本），更主要的是它的内容。

刘绎为清末状元，江西正三品升军团练。他与曾国藩（当时湖南湘军团练）是同时代，同职位的人，在其往来信札中，多有述及太平天国军作战的军机。此外还有一些地方人文参考资料。这些资料都是其他地方和书籍中所不易得的第一手资料，它对于近代史的研究，近代战史的研究，都是很有用的。如果把这类资料和湖南省图书馆收藏的曾国藩，曾作荃，左宗棠等人的手札合并研究，那就会发现和得到过去许多未曾发现过的有用的资料。可是，像这样一类史料和普通古籍，由于它距现代的时间较近，往往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如不及时收集很容易散失。又如《庐陵诗存》（清，吉安，胡友梅撰），《吉州人文纪略》（明末清初，赖良鸣撰），《与续吉州人文纪略》（清，欧阳世等撰）以及《丰阳人文纪略》（明，永丰，聂芳声撰）等都记载了大量有关当时的人和事的有价值的资料，要重视地方文献的史料价值。

漫话卷册

——并为出版大部头书者进一言

李长路

什么是卷？什么是册？从历史沿革来讲，一言难尽，不过也能粗略地谈清楚；从今天看来，很简单，大约“卷”是作为一个大的单元来利用的；而叫做“册”或“本”则是依篇幅长短、部头大小来分订成册的。但在装订时，一册书，或上、下二册，或上、中、下三册，背脊不标卷数，翻检起来，读者感到问题不大；可是一遇到大部头书，问题就来了。举中华书局新印本《二十四史》为例（加《清史稿》也可说是“新廿五史”吧），那虽是做了好事；可是美中不足的是，当你要查“某卷”某人的传记时，那就

够麻烦的了。你从第一册翻目录，那某人项下也标出了页码（可是在哪一册未标），

“卷”第也有，却又不知是在第几册上。卷数目录上还能看出，这虽然也有，却只能从每册每页的第二面边页上见到，最多在每册的扉页上也标有“卷几至卷几”，这用处并不很大，还得来些无效劳动才能翻到所要的“传”（表、志也如此）。为什么我们不把扉页上新标记的的卷数也标在精、平装本每册的背脊上，线装本的每册封面上和书的底边呢？而单标出纪、志、表、传就够了吗？看来好像是要废除“卷第”的样子，却又不像废除，实际上也废除不了。新出的新书也往往还是要分卷的，何况是新印的古笈？

因此，沿革还是要讲讲，源流还是要牵扯到一点。也不需更多来引经据典，但何为卷，又何为册，还是有案可查的，只好也带点“释卷”、“释册”性质了。

明胡应麟（1551—1602）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凡书，唐以前皆为卷轴，盖今所谓一卷，即古之一轴”。这就告诉人说，自从有纸张（或者更远一些说有绢、帛）发明以来，就有了“卷轴”形式的书笈，这就叫“卷”；同时，它又是一个篇章或一个单元的名称，书写人或著作人写到一个段落，就把这长片纸，用木轴卷起来，成为一卷；接下去，就二、三、四、五、以至数百的卷，更长者千卷、万卷。这就是它的外形与内含（涵）结合起来，称之为卷，卷起来的卷，也是一个单元的卷，二者全是一回事。想当年古人著书不易，读书也是展开一卷（叫做舒卷）边看、边开、边捲，然后读毕捲起捆好，或放在桌案间，或插入瓶箬内；许多卷，再合捆一束，或用包袱（有专名，此从略）包好。看来，元、明以来戏曲舞台上表现读书时，已不知有卷轴，读书人所读之书必然是以线装书本作道具（只有宣读圣旨的“圣旨”是卷轴式）；岂止戏剧舞台，连明清不少名画家笔下的历史人物读书时，也

不论是任何朝代，都一律手捧一本线装书（或置案头），也和舞台一样如关羽读“春秋”（《左传》）之类，虽出名家，也所不免。时移世异，却也难怪。其实画家展玩欣赏古人书画长卷，已有经验；特不知古笈也是有小卷，最多知道有唐人写经（佛经）而已。至于册页，胡应麟接着（上面）说：

至装辑成帙，疑皆出雕板之后；然六朝已有之，阮孝绪《七录》，大抵五卷以上为一帙。前代书帙之制，仅此足征。（引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一）

什么是册？胡应麟上面一段话已有新交代，大致不错。在唐宋至五代雕板印刷发明后，至宋、元而盛行起来，这时由帙页装订成册，线装书行世是无疑的了；不过中间还有用浆糊粘贴起的蝴蝶装，也与今天的平装书相近，但它可能没有线装本那么普遍而时间长久。

其实，所谓册，并不是唐以后才有，也不是有了纸和印刷术后才有；也如卷轴之先有“帛书”一样，为时很早。这就是，远在先秦，春秋、战国之世或更早，就有“简册”存在。这所谓册，也名“策”，就是用竹简串成的简册，你看“册”字的形状就可以知道它的形式和它的起源，那是在竹简长条的顶端钻一个孔，用绳子、丝线串连起来，甚至用皮条栓起，就成“书”了。孔丘读《易》，“韦编三绝”，就是皮革绳子断过三次，读一次必然用好长时间，反复翻阅起来就会磨断，再重装订新绳。那时读书难，写起来更难，据称“刀笔”，就是用刀子在竹片或木块上雕刻文字，或用漆书才进了一步，到汉代才用墨为多。所以册的演变，比卷还要早得多。

综上所述，大体可以看出“书史”的轮廓来：

简册——→卷轴——→册帙

（先秦至秦汉）（东汉至隋唐）（五代至近代）
以上是书笈装订发展演化的沿革，只是主要

的简单情况。在这中间，还有秦汉前后的帛书，隋唐前后的龙鳞装（又名旋风装，便于翻检），宋元以来的蝴蝶装（似为线装书之前身，明清时也间而有之），以及唐宋（或更早）以来的经折装（佛经与碑帖多用之），如此等等，名目繁多，形式多种多样，但上面这几类不占主要地位，无需赘述；而最主要的还是卷与册，沿至今日，用法虽变，名称尚不能废。

从简册到卷轴，再由卷轴发展而成为线装本，卷的性质已起了变化。它已不是装书的“形式”了，已经变成书的组成部分的“单元”了；这已不是“卷轴”，而变为“卷第”了。今天我国出版的书籍，主要是从外国输入的平装书和精装书，这是大量的；平装以外的线装新书是少量的了。但，“卷第”性质的卷还是一直沿袭下来的。看来，分卷既分单元，则变动的可能性不大；册页则因版本不同而不能固定下来，这就不能不标卷。有的书一卷也就是一册，有的却一册不只限于有一卷；当然也有不论卷的，这大约是废除了卷的——其实古书如章回小说，则已是以章回代卷（有的也卷与回并用）了。我要讲的，不是新书问题，而是就整理古籍而论，提出我的一点建议：即如前举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印“廿四史”，“卷”既免不了，还必然得承先启后，标有卷第，那就希望在再版时，精平装的背脊上，线装本的底边上也标出卷数来，不只标册数的次序与“纪”、“志”、“表”、“传”就完了，那是交不了账的。说实在的，我自己就是用水笔在自己的书背上标了卷数，过不久又看不清了，也只有在精、平装上这么办了，线装本（我是三种参差都有的）很不好办。我的书这样也算了，但今后要用的人还要多得多，应不应该在书外面印上“几卷至几卷”数字呢？还可编一本索引，有卷次与册次，甚至有页码，那就更好。我希望要考虑考虑。这只是举了一部大部头的丛书为例，随便再举一

部，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的《春秋左传集释》五册，也不好查；怕其他的古籍要重印的还多得很，却都应该考虑一下吧？

我想在为四个现代化奋斗的时代，大家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如何查检历史资料也得节省点时间吧？以“廿四史”说，难道在过去的“百纳本”、“涵芳楼本”已经能做到的，而我们还落在他们的后边吗？难道我们可以因为标点、校印出来，就认为是远超前人而满足自己吗？是的，只有在新中国才做了校印廿四史这件大事，出版又快又好，应当称道；可是虽有册数与页码，而不见卷数与册数的结合，这点美中不足之处，如能再处理妥当一点，那就锦上添花，能为广大读者与研究人员所欢迎了。想来，出版界与编辑同志和专家们，做点“一举手一投足之劳”的小事，为人民服务得更好一点，又何乐而不为呢！

以上只不过是举了“廿四史”一例而已，以此连及其他大部头巨著，无不如此。至于专门来讨论：册、卷、本、叶（页），早有叶德辉（1864—1927）所著《书林清话》（其他小册子似有过）可供参考，不是我要想多谈的。我只是想把“卷”的利用，用历史事实说明一下，也许不是多余的吧。至于演历史戏与绘历史画，那问题怕还更多（服装道具）；但那也难说，比如表现春秋时的古人一定要手执简册（带有韦编），恐怕现代人都会把它当作是说快板书用的“快板”或奏乐者用的“排箫”之类的东西，不一定知道那是读“书”，还是干什么的。总之，书的编排、装饰，也要现代化。

下面试咏一首四言仄韵小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卷册相沿，
时迁境变。
继往开来，
仍难割断。

（1980年5月）